



中央民族大学特色教材

古代突厥语语法

◎ 耿世民 魏萃一 /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中央民族大学特色教材

第1版 (2010年) 第1次印刷

古代突厥语语法

耿世民 魏萃一 / 著

ISBN 7-309-07212-3 定价: 35.00元

古代突厥语语法

耿世民 魏萃一 / 著

35.00元

民族出版社

北京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内大街2号

电话: 010-68413812

邮编: 100081

民族出版社

北京

830×1130

350千字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1298-78-81108-3

35.00元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代突厥语语法/耿世民, 魏萃一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81108-824-3

I. ①古… II. ①耿… ②魏… III. ①突厥语—语法—古代 IV. ①H21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9197 号

古代突厥语语法

著 者 耿世民 魏萃一
责任编辑 李 飞
封面设计 布拉格工作室·傲 腾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824-3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古代突厥语语法》原为 1976 年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受当时新疆有关方面的委托开办的古代突厥语班编写的教材之一。在我主持下编写了《古代突厥——回鹘语文献选读》共 8 册：其中《古代突厥文碑铭选读》一册，《回鹘语文献选读》上下两册，《喀喇汗王朝文献选读》上中下三册，以及《古代突厥语文献语法》和《总词汇》各一册。当时这套油印教材曾在社会上流传，受到有关方面的好评。

2005 年在该教材第一册的基础上，经过修改、补充，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拙著《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一书。教材《回鹘语文献选读》2006 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古代维吾尔语文献教程》（耿世民编著、买提热依木整理）。《喀喇汗王朝文献选》也将整理出版。本书中的例句主要取自上述三部书。

编写这册《古代突厥语语法》时，主要参考了德国著名古代突厥—回鹘语文大师葛玛丽（Annemarie von Gabain）的《古代突厥语法 Alttuerkische Grammatik》（该书汉文译本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已被作者译成汉文。2005 年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

本册语法主要为对下述三个时期古代突厥文献语法（包括语音、方言、语法）的描述：（1）漠北发现的鄂尔浑碑铭（6—9 世纪，即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时期），（2）吐鲁番地区出土的高昌回鹘王国时期的文献（9—14 世纪），（3）喀喇汗王朝时期（10—12 世纪）的文献，如《突厥语大词典》、《福乐智慧》等。

由于在上述时期用不同文字写成的文献在语言特点方面差别不大，因而本书不按照文字和时代分段描写，而是力求对不同文字、不同地区的文献语言作统一的概括分析和介绍，以反映整个语言历史时期的书面语的全貌。对于某个时代文献的历史、方言现象仅作附带说明。

原教材由我执笔编写前面几章，后面词法中一部分由魏萃一教授根据我提供的材料编写。原教材缺句法部分，现也由我补上。

这次出版时由我对原教材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并增加了选文和字典。全书文字由我负责。附录中收入了我从法文翻译的丹麦汤姆逊氏 1893 年解读古代突厥文的初步报告和法国路·巴赞氏的一篇关于古代突厥碑铭的论文。

原教材使用的是维吾尔拉丁字母新文字，现一律改为国际突厥学上通用的拉丁转写字母。

由于作者水平所限，且缺乏参考书，加之年老体衰，又忙于教学任务，错误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耿世民

2010 年 7 月

目 录

导 论	(1)
古代突厥文、回鹘文及方言概述	(45)
第一章 语 音	(72)
第一节 元音	(72)
第二节 辅音	(75)
第三节 语音和谐律	(80)
第四节 增音现象	(81)
第五节 减音现象	(81)
第六节 语音的交替	(82)
第七节 语音的换位	(83)
第八节 音节结构	(83)
第九节 重音	(84)
第十节 长元音问题	(84)
第二章 词 汇	(85)
第三章 词 法	(88)
第一节 词的构成	(88)
第二节 名词	(95)

2 古代突厥语语法

第三节	形容词	(122)
第四节	数词	(127)
第五节	代词	(131)
第六节	动词	(138)
第七节	副词	(167)
第八节	后置词	(170)
第九节	连接词	(176)
第十节	语气词	(178)
第十一节	感叹词	(180)
第四章	句法	(181)
第一节	词组	(181)
第二节	句子	(186)
第三节	引语	(198)
缩写字		(200)
主要参考书目		(202)
语法索引		(203)
选文		(206)
选文字典		(317)
附录		(355)
后记		(389)

Contents

Preface.....	(1)
Introduction.....	(1)
Outline of the Old Turkic,Uighur Scripts and Dialects.....	(45)
I Chapter: Phonetics.....	(72)
1.Section: Vowels.....	(72)
2.Section: Consonants.....	(75)
3.Section: Law of sound harmony	(80)
4.Section: Phenomena of sound augmentation.....	(81)
5.Section: Phenomena of sound loss.....	(81)
6.Section: Interchange of sounds.....	(82)
7.Section: Metathesis of sounds.....	(83)
8.Section: Construction of syllables.....	(83)
9.Section: Accents.....	(84)
10.Section: Long vowels.....	(84)
II Chapter: Lexicon.....	(85)
III Chapter: Morphology.....	(88)
1. Section: Parts of speech	(88)
2. Section: Nouns	(95)

3. Section: Adjectives	(122)
4. Section: Numerals	(127)
5. Section: Pronouns.....	(131)
6. Section: Verbs.....	(138)
7. Section: Adverbs	(167)
8. Section: Postpositions	(170)
9. Section: Conjunctions.....	(176)
10. Section: Particles	(178)
11. Section: Interjections	(180)
IV Chapter: Syntax.....	(181)
1. Section: Phrase.....	(181)
2. Section: Syntax.....	(186)
Abbreviations	(200)
Bibliography	(202)
Grammatical Index	(203)
Selected Texts	(206)
Glossary of texts	(317)
Appendixes	(355)
Postscript	(389)

导 论

一、古代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和解读研究

古代突厥文是在我国北方建立的突厥汗国（552—745）和回纥/回鹘（古代维吾尔）汗国（745—840）使用的文字。因其在外形上与古代日耳曼民族使用的如尼（Rune）文相似，所以有些学者称之为古代突厥如尼文。又因为用这种文字写成的主要碑铭是在蒙古鄂尔浑（Orkhon）河流域发现，所以也称之为鄂尔浑突厥文（Orhon Turkic Script），语言称之为鄂尔浑突厥语（Orhon Turkic）。还因为这种文字也在叶尼塞（Yenisey）河流域发现，所以也称之为叶尼塞文^①。

这种文字除为突厥汗国使用外，也为西迁前的回鹘人和古代居住在叶尼塞河流域的黠戛斯人（今柯尔克孜人的祖先）使用^②。

下面简要叙述一下古代突厥文碑文发现和研究的情况。

在我国汉文史籍中曾记载，公元6世纪左右突厥人已有文字。如《周书·突厥传》中说：“其书字类胡。”《北齐书·斛律羌举传》中一段记载也表明当时突厥人似已使用文字：“代人刘世清……通四夷语，为当时第一。后主命世清翻《涅槃经》以遗突厥可汗。”^③（按：此事发生在公元574—576年间突厥陀钵可汗

① 此外，还有人称之为兰突厥（Kök Türk）文、西伯利亚文、前伊斯兰突厥文等。

② 今中亚七河、费尔干和高加索、顿河流域以及东欧发现的如尼文铭文还不能完全解读。

③ 根据近年来在蒙古布古特地方和新疆伊犁地区昭苏县发现的属于第一突厥汗国时期的两块用粟特文粟特语刻写的碑铭来看，当时突厥人还使用粟特（所谓的“胡人”）语文作为自己的书面语。

在位时)

但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文字，其结构如何，直到 19 世纪末期以前我们并不知道。

早在 1692 年荷兰人魏津 (N. Widzen) 在其所著的《北部和东部鞑靼里亚》(Noord and Ost Tartarye, Amsterdam, 1692) 首次提到西伯利亚存在刻有古代突厥文的刻石。1696—1697 年俄国人雷米佐夫 (Semen Remezov) 在其《西伯利亚图录》(Chertezhnaya Kniga Sibiri) 一书中也提到七河一带发现这种文字的碑铭。

关于突厥文碑铭的科学报道属 18 世纪上半期。18 世纪第一个 25 年首先是叶尼塞碑铭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且泽 (Danzig, 今属波兰) 人梅色尔施米特 (D. G. Messerschmidt, 曾作为科学家和探险家服务于帝俄彼得大帝) 于 1721 年发现了现称为“Uybat III”的叶尼塞碑文。1730 年瑞典人斯特拉林别尔格 (F. J. Stralenberg, 他曾在西伯利亚一带生活 13 年之久) 在斯德哥尔摩出版了《欧洲和亚洲的北部和东部》(Das nord-und oestlichen Theil von Europa und Asia, Stockholm, 1730) 一书, 在该书后面附有第一批在叶尼塞河流域发现的用这种文字写成的碑铭图片。1793 年帕拉斯 (P. S. Pallas) 又在其《论西伯利亚发现的一种不知名碑文》(Von einer in Siberien gefundenen unbekanntenen Steinschrift) 一文 (载该氏所著《自然史与经济学 Naturgeschichte und Oekonomie》卷五, 237-245 页) 中公布了一些。1818 年斯帕斯基 (G. Spasskiy) 在《西伯利亚通讯》(Sibirskiy Vestnik)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西伯利亚古物札记》(Zapiski o Sibirskikh Drevnostyakh)。不久该文连同图片一起被译成拉丁文登出后, 立即引起了西欧学者的注意。1822 年当时法国著名东方学家雷缪扎 (A. Remusat) 在一篇关于此文的评论中写道: “如能解读这些碑文, 这将对解决 (该地区的) 重要历史文化问题起巨大作用。” (Journal des Savants, Octobre, 1822, pp. 595-602) 此后, 有不少人研究和试图解读这种“谜”一

样的无人知晓的文字。1884年芬兰人阿斯培林(J. R. Aspelin)在比较研究了碑文中的所有文字符号后,虽正确地提出这种文字大约由39~40个符号组成,文字的书写是从右到左,但仍无法确定符号的音值。

同时,在此期间关于是什么民族留下这种文字的碑铭的问题,也提出了各种猜测意见:如古代匈奴人、古代芬兰人、古代突厥人、古代蒙古人等。

1889年俄国考古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组织的以雅德林采夫(N. M. Yadrintsev)为首的蒙古考古队,为研究、解读古代突厥文提供了新的材料。

雅氏在这次考察中到过今蒙古共和国的土拉河、鄂尔浑河一带,并粗略地探察了蒙古故都哈拉和林(Qara-qorum)和回鹘汗国故都哈拉巴喇哈逊(Qara-balghasun)遗址。他在鄂尔浑河流域的和硕柴达木(Koshotsaidam)湖畔发现了轰动当时全世界学术界的《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①。关于这次的发现,雅氏在其《蒙古及鄂尔浑河上游考察总结》一文中这样写道:“非常坚固结实的花岗石千百年来被侵蚀的情况表明,它们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碑上刻有前在西伯利亚其他地方也曾发现过的、谜一样的如尼文(按:指古代突厥文)。在边上和背面并刻有契丹字(按:指汉文)。如果是汉文的话,很可能就是解读(另一种)文字的钥匙。”

在雅氏的发现后,1890年芬兰也马上派出以海开勒(H. Heikel)为首的考古队去蒙古。1891年俄国科学院又组织了以著

^① 关于此二碑的建立和当时唐朝政府派人参加建碑的经过,我国早在1000多年前成书的新旧唐书中就有详细记载。如关于阙特勤碑,《旧唐书》卷一九四中说:“阙特勤死,(玄宗)诏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赍玺书入蕃吊祭,并为立碑,上自为碑文……”700年前,我国13世纪时的诗人耶律铸在其《双溪醉隐集》(《取和林》一诗下的自注)中写道:“和林城毗伽可汗之故地也。岁乙未,圣朝太宗皇帝城此,起万安宫。城西北七十里有毗伽可汗宫城遗址。东北七十里有唐明皇开元壬申(公元732年)御制御书阙特勤碑。”此外,元朝陈宜甫也提到此碑(见《秋声诗集》最末一篇《和林城北唐阙特勤坟》诗,载四库全书珍本初集)。

名突厥语言学家拉德洛夫(W. W. Radloff)院士为首的考古队去蒙古。同年雅德林采夫在蒙古翁金(Ongin)河畔又发现了所谓《翁金碑》。

1892年芬兰、俄国分别出版了两国考古队所拍摄的碑文图录。法文芬兰本题为《1890年芬兰考古队所集鄂尔浑碑文》(Inscriptions de l'Orkhon recueillies par l'expédition finnoise 1890, et publiées par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Helsingfors, 1892)。德文俄国本题为《蒙古古物图录》(Atlas der Alterthümer der Mongolei, St. Petersburg, 1892)。这就给各国学者进一步研究这种不知名的文字提供了可靠的丰富材料。其中尤以芬兰刊布的本子科学价值较高。

这以后,在新发现材料的基础上,俄国拉德洛夫和丹麦著名语言学家汤姆森(V. Thomsen)二人同时在积极从事碑文文字的解读工作。

1893年12月15日汤姆森在丹麦皇家科学院会议上报告了他胜利解读古代突厥文的经过。该报告的法文本题为《鄂尔浑和叶尼塞碑文的解读——初步成果》(Dechiffrement des inscriptions de l'Orkhon et de l'énissei. Notice préliminaire),于1894年在哥本哈根正式出版。

“谜”终于被解开了。原来这些碑文既不属于匈奴人,更不属于什么古代芬兰人,而是属于曾建立强大突厥汗国的古代突厥人。语言是古代突厥语。内容是记述突厥可汗或其王子、大臣的生平事迹和武功。

在汤姆森解读这种文字之前,人们已从《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该二碑都同时刻有汉文)的汉文部分中知道碑铭是属于突厥汗国,语言应为突厥语。《阙特勤碑》并明确刻有建碑年代——大唐开元二年(公元732年)。这些都大大方便了古代突厥文的解读工作。

首先,汤姆森确立了这一点:像汉文一样,古代突厥文字母

是从上往下竖写的（如横过来读，即从右往左读）。字行也像汉文一样，是从右到左书写（如横过来读，就变成从下往上读了）。为此他确定了文字（换成拉丁字母）是这样安排书写的：

g	d	a
h	e	b
i	f	c

这里因技术原因，字行和字母排列如上。实际上每个字母要头在左方，脚在右方，即字母要（逆时针）向左转 90 度。

另外，汤氏根据这种文字的符号多达 38 个这一点，认为它不是一般的音素文字（即字母文字），而是音节文字；或者至少其中一部分在不同的条件下，同样的语音用不同的符号表示。其次，汤氏根据突厥语元音和谐律这一特点，确定了表示 8 个元音的 4 个元音符号。

在解读辅音符号的音值方面，经过深入、仔细的研究，汤氏发现这种文字中的 8 个辅音，因和其拼写的元音不同（即前元音或后元音）而用 8 对符号表示。这一发现对解读整个文字系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之后，汤姆森根据汉文“阙特勤”的古音 k'iwat-te(k)-gin 正确解读了 küi tigin “阙特勤”一名，然后又解读了 tängri “上天”一词。在该二字的基础上，他又解读了碑文中常见的 türk “突厥”一词。到此，文字的解读工作已基本完成。

汤姆森为丹麦著名语言学家，1842 年 1 月 25 日生于 Randers 村。1859 年依照他父亲的愿望进入哥本哈根大学神学院学习，之后转入语文学院。大学期间主修古典语言和北欧 (Nordik) 比较语言学。除欧洲主要语言外，他还通晓梵文、阿拉伯文、俄文、芬兰文、匈牙利文等。1869 年他以《日耳曼语对芬兰—拉普语的影

响》论文获博士学位。1871年任哥本哈根大学语言学副教授，1875年任教授。1877年出版了《古代俄罗斯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关系和俄罗斯国家的起源》一书。1890年出版了《芬兰语和波罗的海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的接触——语言史方面的研究》巨著。他对印度系语言也做过研究。他的名著《（欧洲）语言学史 Sprogvidenskabens historie》至今尚未失去其价值。他一生最辉煌的业绩是对古代突厥文碑铭和写本的研究。另外他在1916年发表了重要长文《突厥学研究 Turcica》（载 MSFOu XXXVII, 1916, 1—107 p.），对蒙古和叶尼塞突厥碑铭中一些难点做了新的考释。他的另一篇论文《论叶尼塞碑文中一不认识的字母 Une lettre meconnue des inscriptions de l'Ienissei》（JSFOu XXX, 4, 1913-1918, 1-9 p.）改正了拉德洛夫错读为 b 的 e 字母。这里顺便还要提到1897年他在第11届国际东方学大会上宣读的著名法文论文《试论回鹘语的辅音系统》（Sur le système des consonnes dans la langue ouigoure, Keleti Szemle II）。文中他令人信服地指明拉德洛夫对回鹘文辅音系统的观点是错误的。他对《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和《噶欲谷碑》三大碑文的最新丹麦文译文由德国学者 H.H. Schaeder 译成德文，发表在德国东方学会刊上（ZDMG LXXVIII, N.F. III, 1924-1925, 121-175）。汤姆森的主要论文收集在他四卷本名为《论文集》（Samlede Afhandlinger 1-4, 1919-1931）中。他的70寿辰纪念论文集《Festschrift Vilhelm Thomsen zur ... 1912》对突厥学来说也很重要。最大的遗憾是：他生前和他的学生 Kurt Wulff 一起准备的《突厥文碑铭总汇》因后者的去世未能出版。

在古代突厥文碑文研究方面，另一位大师就是拉德洛夫（Wilhelm Radloff, 1837—1918）院士。拉氏1837年生于柏林，其父为警官。他在柏林完成小学、中学教育后，毕业于柏林大学哲学系。1858年以《宗教对亚洲民族的影响》的学位论文获德国耶那（Jena）大学博士学位。他为了研究北亚的语言，于同年来到

俄国。1859年到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 Barnaul 地方冶金学校任拉丁文和德文教员，同时开始学习、研究当地的现代突厥语。他在阿尔泰地区共生活、工作了12年。1866—1907出版了他收集、记录的10卷本《突厥方言材料》（即所谓的 Proben）和10卷德文、俄文译文。1872年调任喀山教育督察。1884年后到圣彼得堡任职，任俄国科学院亚洲博物馆馆长。在此期间，他先后出版了《西伯利亚札记 Aus Sibirien》、《北部突厥语比较语音学 Phonetik der noerdlichen Tuerksprachen》、《库蛮语汇编 Codex Comanicus》、《福乐智慧 Das Kudat Bilik（维也纳本）》、《突厥方言词典 Versuch eines Woerterbuchs der Tuerk-Dialecte》等突厥学专著。1889年雅德林采夫发现鄂尔浑碑文后，1891—1991年他全身心地投入古代突厥碑文的调查、解读和研究工作中。1894—1899年先后发表了5大册《蒙古古代突厥碑文研究 Die alttue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St.-Petersburg》、《古代突厥语研究 Alttuerkische Studien, I-VI》，从而对这一学科的开拓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初开始，随同新疆大批回鹘文献的出土，他又把主要精力转入到对回鹘文写本的研究中去，并刊布了这方面的一些重要文献。

拉氏在1893年12月4日写给汤氏的一封信中，已正确翻译了碑铭 III（即《哈拉巴喇哈逊碑》）中正面的文字。这证明他至少已解读了大部分这种字母（参见 Bulletin de l'Academie danoise pour 1893, Copenhagen, 1894, p.294, note）。拉德洛夫在获知汤氏的解读报告后，立即着手《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全文的转写和翻译工作。1894年拉氏发表了该二碑的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的转写和德文译文，书名为上面已提到的《蒙古古代突厥碑文研究》。拉氏取得的成绩虽大，但做得太匆忙。之后，又同样匆忙地出版了三个分册（1894—1895），书名同前：1. Lieferung: 为鄂尔浑碑文（《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的换写和转写、德文译文，2. Lieferung: 为上述二碑的词汇、索引和 W. P. Wassilyev 对《阙特

勤碑》、《毗伽可汗碑》汉文部分的德文译文、苏京城（译音）的汉文录文，3. Lieferung（1895年出版）：为对鄂尔浑碑文的补正、考释及对《翁金碑》、《回鹘哈拉巴喇哈逊碑》的研究（包括和对后者残余突厥文部分的研究和汉文部分的录文[苏京城]、德文译文[Wassilyev]），以及对叶尼塞河流域、南西伯利亚发现的诸小碑的研究等。1897年出版了该书的新编（Neue Folge），内容主要为古代突厥语语法概要及对碑文的补正及词汇。此外，尚有长达30页由W. Barthold撰写的《论古代突厥碑铭的历史意义》一文。1899年出版了同书第二编（Zweite Folge），其中1—122页为对《噶欲谷碑文》的研究，并收有夏德[F. Hirth]的《噶欲谷碑文跋》和巴尔托里德的《古代突厥碑文与阿拉伯史料》两篇长文[拉德洛夫的这五册巨著1987年由德国Osnabrueck市的Otto Zeller Verlag出版社重版（二卷本）]。

1896年汤姆森刊布了阙、毗二碑的拉丁字母转写和法文译文，书后并附有语法附加字索引和帕克尔（E. H. Parker）关于《阙特勤碑》汉文部分的英文译文，书名题为《鄂尔浑碑文的解读》（Inscriptions de l'Orkhon Dechiffrees, Memoires de la Societe finno-Ougrienne, Helsingfors, 1896）。书中有对《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的法文译文和研究，同时指出拉氏的一些错误。

这两位学者之间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有好处的，但也给古突厥碑铭的研究带来了不利的东西：即他们权威性的结论带给这个领域研究中的某种教条主义。这方面成问题的是方法论占很大成分。直到今天科学界（尤其是那些不能直接读原文的历史学家）关于蒙古和叶尼塞古代突厥碑铭的知识仍完全建立在汤氏和拉氏著作的基础上。

在此以后又有一些重要突厥文碑铭的发现。1896—1897年卡拉乌尔（V. Kallaur）和海开勒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塔拉斯（Talas）河流域发现了属于西突厥汗国的《塔拉斯碑》。1897年克